

新注古典诗文十大传统选本

总 序

“新注古典诗文十大传统选本”，是择选本之精华而组合起来的新编丛书。选本者，顾名思义，即选录古典诗文而成之集；传统选本，即是历经各代名家择优而成且为世人所认可而流传下来的名著者。查选本之所以成为名著的原因，或因选者的眼光之高使所选皆为精品，或因所选作品的作者多为名人，或因选者是有较高地位的名人，但其中主要的原因是选本甄录作品之精到、所选作品意义之大和审美价值之高。诚如鲁迅所认为的那样，“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集外集·选本》）本丛书就

是以古典诗文词曲的选本为范围，从其中选择出来的意义广、影响大、审美价值高的堪称精品的名著，包括南朝梁萧统的《昭明文选》、五代十国时后蜀赵崇祚的《花间集》、宋刘克庄和谢枋得的《千家诗》、宋周密的《绝妙好词》、宋赵闻礼辑的词集《阳春白雪》和元杨朝英辑的散曲集《阳春白雪》（合为一本）、清吴调侯和吴楚材之《古文观止》、清孙洙之《唐诗三百首》、上疆村民之《宋词三百首》，以及清乾隆皇帝御选的《唐宋诗醇》和《唐宋文醇》。

本丛书之首部为《昭明文选》，但这并不等于说古典选本就是从它开始的。可以说，中国古典文学选本的渊源是相当久远的。上古时代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以及汉人编辑之《楚辞》，实际上都是选本，它们实际是中国古典文学选本之先河。

作为诗文选本的总集，在《昭明文选》之前可以知道的尚有西晋杜预的《善文》（五十卷）和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可惜的是这两部选本均佚。这样，流传到现在的最早的诗文选本总集，自然

当是《昭明文选》了，《昭明文选》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选本。自《昭明文选》问世以后，形成了“文选学”，出现了“选体”，选本的编纂也日趋繁荣。可以说，《昭明文选》标志着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时代，即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时代。

从中国文学史上来看，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一个文学理论著作繁盛、文学思想活跃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先后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以及刘勰的《文心雕龙》等。这些理论著作虽然都有各自的观点，但都突出地强调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典论·论文》强调“文以气为主”、“诗赋欲丽”；《文赋》把创作看成是想象的思维，提出所谓“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构思心理历程，对于作品则要求注意铨裁以使辞意双美、通过警句以使主旨突出、避免雷同而力求独创、保留精美的词句以避免文章的平庸；《文心雕龙》虽然开篇便提出“原道”、“宗经”、“征圣”，但并没有忽视载道征圣之文的形式和艺术性，其在“铨裁”、“情采”、“神思”、“风骨”诸篇中的论述，都强调了作品的风格和形式美，都

强调了语言的表达和艺术的魅力。由此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思想已经确立；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作品与学术文章的界限已经开始区别开来。鲁迅在评价曹丕“诗赋欲丽”的观点时曾说：他说诗赋不必富于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的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里所谓的“文学的自觉时代”，无非是说在这个时代里，近代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观念已经发生了。

《昭明文选》可说是成书在这个“文学的自觉时代”，编选者生活在这个“文学的自觉时代”（稍后），其选文对作品艺术性的重视是必然的。《文选》选录诗文的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注意到了文学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两个方面，是建立在把文学作品与学术著作区别开来的基点上的，所以它是经书不选、诸子不选、繁博的记言文不选，因为选者把它们视为学术著作类

的作品，用现代的话来说，即把它们看成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

《昭明文选》提到“文籍”的发生时，曾作如下比喻：“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凜。”意思是说，天子祭天时所乘的大辂（车名）是从原始的椎轮（没有辐条的形状如椎的简陋的车）发展来的，可是大辂已经不保存椎轮的质朴形式了；层冰是由积水形成的，可是积水是不会像层冰那么冷的。这一方面可能是在说，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是由它之前的时代的文学发展来的，但它已经没有它之前的时代的文学质朴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包含着文学作品源于生活而又比生活更高的思想，即所谓的“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文选序》）。这是萧统文学观点的重要方面，建立在这种重要观点上的《昭明文选》，更看重文学的艺术性，是很必然的。《昭明文选》重视艺术性的观点，直接影响到后来的选本。

《昭明文选》问世以后，注释者、研究者日多，至隋之曹宪则出现了学习《昭明文选》的新局面。

曹宪生活于隋唐时代，仕隋为秘书学士。他精于小学，曾注《文选音义》，并以其作为教材传授塾生，于是作为一门专业学问的“文选学”开始形成。随着“文选学”的逐渐形成，所谓的“选体”也出现了。“选体”，即仿萧统《昭明文选》著录的古诗之体所作的诗。“选体”诗与唐以后的近体诗相对称，足见《昭明文选》作为诗文选本的影响之大；影响的结果，便是文学选本的日趋发展。

《昭明文选》之后，接着便出现了南朝陈徐陵编选的《玉台新咏》，这是《昭明文选》之后的一部诗歌选本总集，它选录了汉魏至南朝梁的诗歌共七百六十九篇。到了五代十国，后蜀的赵崇祚编选了《花间集》选本，选录了唐五代词十八家、词作五百首，使这一时期的许多词作赖此选本得以保存。《花间集》，是现存文人词作选本总集最早的一部。到宋代的太平兴国年间，由李昉、徐铉、宋白等十七人奉敕编纂、后由苏易简、王祐等续修的诗文选本总集《文苑英华》问世。这是对《昭明文选》以后至唐代的诗文的汇选，全书

一千卷，收入作者两千二百人，选录作品二万零三百篇，五十五类文体。这个选本由于卷数太多，不便通读，所以宋之姚铉又从其中选出唐文十分之一，成选本《唐文粹》一百卷，这可谓选本之选本，被推为善本。到了南宋时代，吕祖谦仿萧统《昭明文选》的体例，选录宋人的诗、赋、奏疏、杂著等凡一百五十卷，成《宋文鉴》（又名《皇朝文鉴》）。这是宋之诗文选本总集，基本反映了北宋的文学概貌。南宋的诗文选本总集，有清庄仲方选编的《南宋文苑》，成书虽在清代，但却反映了南宋诗文之一般。宋人编选的诗歌选本，流传最久、影响最大的，是刘克庄和谢枋得的《千家诗》，该书所收为唐宋时代的律诗绝句。宋词的选本总集，影响较大的，则数宋周密选编的《绝妙好词》和南宋赵闻礼选编的《阳春白雪》。到了元代，元散曲的选本总集有元杨朝英选录的《阳春白雪》；诗文选本总集，则有元苏天爵编选的《元文类》，全书凡七十卷，选录元初至延祐、正元间的诗文四十三类，后人把它与姚铉的《唐文粹》、吕祖谦的《宋文鉴》等并列而称。到了明代，

明人程敏政编选了诗文选本总集《明文衡》，全书九十八卷，选录了明人的辞、赋、乐府、散文等，未收古诗和近体诗。

清代是选本发展的鼎盛时期，本丛书所收的选本名著，大半为清人所编，如《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晚清）等文与诗的选本总集，都成了影响广远的文学名著。其中，《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都已成为了当时家塾的启蒙读本，以至出现了“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联语佳话。清代中叶，乾隆皇帝诏命文人学士编选《唐宋诗醇》和《唐宋文醇》，这是唐宋时代的诗歌选本和散文选本，足见清代的统治者对于选本的重视。在前代选本的影响下，加上清统治者对选本编纂的重视，一些文人学士编纂选本的势头兴起，于是出现了沈德潜编选的《古诗源》和《唐诗别裁》、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姚莹的《乾坤正气集》、许梈的《六朝文絮》、储欣的《唐宋十大家类选》、李兆洛的《骈体文钞》、王士禛的《古诗选》、王闿运的《八代诗选》等等。到了近代，诗文选本则有高步瀛

的《唐宋诗举要》、《唐宋文举要》等。可以说，自《昭明文选》起至清与近代的诗文选本，确实堪称选本艺术的长河。这反映了编选选本的历史价值。

古典文学选本的价值是多方面的。

首先，选本由于其便于流传，所以保存了历史上（特别是较远的古代）一些作家的作品。许多文学史上的事实已经证明，一些作家个人的专集没有流传下来，他们的作品只是在一些流传下来的选本总集中才能见到些许。例如《昭明文选》中所收的作家，有些人的作品集（诗集、文集等）已经失传，只有《昭明文选》保留了他们的部分作品，成为今天的人研究他们的唯一文学文献。昭明太子萧统的作品集也已失传，可他编纂的《昭明文选》却流传了下来。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读作家作品的专集者少，读文学选本者多。例如清人，“读《古文辞类纂》（姚鼐编的选本）者多，读《惜抱轩全集》（姚鼐作品集）的却少”，所以鲁迅才说：“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

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集外集·选本》）可见，选本在保存作品和流布文学主张方面都是做出了贡献的。

其次，选本由于其或为一个时代的作家精品的选集、或为几个时代（历史时期）的作品的精选，所以对于了解一个时代或几个时代的文学面貌具有重大作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作家作品的专集、全集，可是由于它们卷帙之浩繁和作品篇章数量之大，所以很不便于一般读者去全读（或没有能力去全读）。例如唐五代的作家就有三千多，想通过阅读他们的专集、别集来了解这段历史的文学面貌是很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选本就成了急就方便之读物，读者通过读选本可以较为容易地了解到唐五代时期的文学概貌。虽然选本不及全集那么完整、全面，但由于其是经过“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集部总叙》），所以其中的作品多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反映了作品产生的那个时代的面貌的作品。通过阅读这些作品，自然可以窥见该时代的文学发展情状。

再次，选本表露出来的选家的文学观点、选择标准，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想的组成部分，同样是重要的文化美学的财富。选本，或者是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或者是于群籍中采其合于自己意见者为一集，或者于一书中删去其不合于自己的而成新书，都会传达出选者的美学观点和艺术思想。读者读选本一方面可以读到选本所选作家的作品，一方面还可以学到选家的艺术美学理论。

总之，选本的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广泛的。“新注古典诗文十大传统选本”是从众多选本中选出来的更为精粹的、流布更为广远的、影响更大的优秀选本。其中，《阳春白雪》、《绝妙好词》、《唐宋诗醇》、《唐宋文醇》为首次加注出版。为保持选本的历史文献价值，新注本基本上保持了选本的原貌，保留了原著的序跋，未动原著的卷次，未删原著的选篇；为了方便今天的读者，新注本除对一些词语加以注释外，并对原文进行了分段，同时于注①中对作者进行了介绍、对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作了简要分析。新注本前所加前言，重点

介绍了选本的编纂者、选本的编纂过程以及版本和影响等。限于编者和注者的水平，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衷心盼望读者指正。

马 清 福

1994 年 10 月 20 日

于盛京陵西小舍

前 言

《绝妙好词》，南宋周密编纂。

(一) 关于编纂者周密。夏承焘先生《唐宋词人年谱》中关于周草窗年谱考证甚详。周密（公元1232—1298），字公谨，号草窗、蘋洲，又号四水潜夫，弁阳老人，华不注老人。其先为济南人，曾祖随高宗南渡，始居吴兴。其祖周玘，刑部侍郎，赠少保，以廉俭称。其父周晋，字明叔，号啸斋。曾宰富春、监衢州、知汀州，富收藏。其母系参知政事章良能女，颇通翰墨。由此可知其家教深厚。周密曾于宋末作过临安府幕属，监和济药局，充奉礼节、监丰储仓、义乌令。宋亡后遽隐不仕，抱遗民之恨以辑录宋代文献、家乘旧闻为己任，有《齐东野语》、《癸辛杂识》等书，寄托其故国之思。《绝妙好词》七卷结集于宋亡之后，追怀故旧，寄托遥深。“不无荆棘之悲，用志黍离之感”（柯煜序）。周密工诗，尤工歌词，与王沂孙、张炎同称为南宋三大词家。有《草窗韵语》、《草窗词》传世。周密体貌豪伟逸秀，善画梅竹兰石，书学欧、柳。其品行人格，为当时人称道，“介然特立，足以增亡国之光。”

(《王行題周草窗画像卷》)。綜觀周密一生，正值宋末元初變亂之際。宋亡時，他四十五歲。他在入元的二十餘年中，已漸趨老境，世事滄桑，屢多變故，其心情如何，從當時人爲其作詩序中可見一斑：“晚年展轉荊棘霜露之間，感慨激發，抑鬱悲壯，每一篇出，令人百憂生焉，又烏烏然稱其累臣羈客也。”（戴表元、馬廷鸾《剡源文集》八·《周公謹弁陽詩序》）。《絕妙好詞》卷七中有周密自選詞作，多感時傷懷之語，從中可見作者難言隱痛。讀者應細細品味，不可忽略而過。

（二）關於《絕妙好詞》的價值。這一詞選共收錄南宋一百三十二人詞作近四百篇。始於張孝祥，終於仇遠。衆所周知，任何一種選本都是選家審美情趣的反映。從周密所選詞家詞作看，大都以清麗婉約為主，而不錄忠憤激昂豪放之作。如辛棄疾僅選三首，而姜夔則選了十三首，吳文英則選十六首。但這一選本，卻得到同時代著名詞家、評論家張炎大力推崇：“近代詞如《陽春白雪集》、《絕妙詞選》亦有可觀，但所取不甚精一，豈若草窗所選《絕妙好詞》爲精粹”（《樂府指迷》）。張炎論詞的最高標準是“意趣高遠”、“雅正”和“清空”。夏承焘先生指出：“前人論詞有‘豪放’‘婉約’兩派的爭論，是朱非素，本來有許多是不正確的说法；到了張炎，改‘婉約’而倡‘清空’，它和‘豪放’派的距離就更遠一程了。因為蘇、

辛‘豪族’派诸作家还作了许多‘婉约’的作品，就拿张炎‘清空标准来要求他们，就更其格格不入’，“当时主张复雅的一派词人，一方面反对柳永、周邦彦的“软媚”，另一方面也反对苏轼、辛弃疾的“粗豪”；曾慥的《乐府雅词》辑于南宋初年，六卷中竟无苏轼一字；南宋末年以“志雅”名堂的周密选《绝妙好词》，只取辛弃疾三首，这可见这些雅派词人的看法。”（《词源注》前言）。因张炎观点体现当时的词坛风尚，周密的选本又与他的观点相应，他对周密这一选本推崇备至也就不足为奇。至清代《四库提要》亦谓：“在曾慥《乐府雅词》、黄昇《花庵词选》之上。”足见张炎评价影响之巨。清代也有人指责周密所选“皆同于己者，一味轻柔圆腻而已”。（焦循，见《雕孤楼词话》）以上诸评是耶，非耶，自可再论。但，从词发展流变史看，这部选本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词坛风尚以及风格流派演变史的极可贵的参考资料，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当然，选本中所辑录的有关宋人词集、作者等资料也是零玃碎玉，弥足珍贵。

（三）关于《绝妙好词》的版本流传。此选本没有宋版，亦无明刻本。清厉鹗康熙六十年跋云：“在元时已为难得，有明三百年乐府家未曾见其只字。”清初钱谦益绛云楼藏有钞本，后归钱曾述古堂。康熙年间始有柯煜、高士奇据钱藏钞本刊行。乾隆年间查为仁、厉鹗同为之笺

注。“或因词而考证其本事，或因人而附载其逸闻。”（《四库提要》）为此选本的阅读和流行提供了方便。嘉庆、道光年间，余集从宋人杂著中辑录与草窗有关的词作，别为一卷，其目的是“用补樊榭（厉鹗号）之阙……而草窗所录词见于杂著者，多同时人所赋、为绝妙词之所未载，因别为一卷，而其人与事有可备采摭者，亦仿樊榭之意备录于篇”。他将周密杂著中收录而《绝妙好词》中未收之词另编一集，自称是继草窗之志。道光年间开雕时，瞿世瑛将此重为编次，徐楸又从《武林旧事》等书中采摘诸篇，另成一卷。至此，遂以《绝妙好词笺》七卷、《续卷》二卷（共432首）传世。

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3年据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清道光八年徐楸爱日轩刻本影印，并于书前增一总目。

注释即根据上海古籍的影印本，卷数目次编排，一仍其旧，未作变动。其中有个别篇章个别字句参照其他版本有改动，并作说明。周密编纂的《绝妙好词》自乾隆年间查为仁、厉鹗同为之笺注后，管见所及，尚未有新注。查、厉笺注之功不可没，但对今天读者来说，尚失之简略。今不避浅陋，勉为之注。查、厉之笺可用者则冠以“查、厉笺曰”字样，照录；其所连类而及引用其他词作，因有别本可见，故删节不录。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难免有

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指教，以便改正。另外，常青海、宋景旭、郭丕典、曹晖、傅金纯五位同志也注释了部分篇章。

刘 维 治

1994 年 10 月